

DOI:10.3876/j.issn.1671-4970.2025.05.00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社会生产力属性的三重向度

桑延海,刘兴平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发展理论,具有社会生产力的属性和向度。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来看,“两山论”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辩证关系的论述,蕴含着自然力的客观性、社会生产力的自然力源泉以及自然力向社会生产力科学转化的思想;生态民生论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自然资源产权体系建构的论述,蕴含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社会生产力异化形态的超越,即对“资本的生产力”的反生态性、无民生性和非法性的系统反思和超越;新发展理念对绿色生态新发展模式的理论建构,蕴含着推动社会生产力由异化状态回归本质,或者说推动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想。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也是关于文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既是对社会生产力的科学认识,也是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也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理论。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社会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两山论”;生态民生论;新发展理念

唯物史观指出,“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1]170}。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自然力转化而来的社会生产力往往为私人占有和垄断,这不仅导致社会生产力异化为“资本的生产力”^{[1]392},成为支配和剥削他人的社会权力,而且助长了人们盲目征服自然力的冲动,激化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所以,生态问题本质上是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如何评价发展?”的深刻反思,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为经济谋发展、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社会谋公正、为世界谋大同的理论。基于此,立足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理论,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

论”)、生态民生论和新发展理念为切入点,纵向阐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社会生产力属性,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存在基础、异化超越和本质回归向度,对深入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图1)。

一、“两山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社会生产力存在基础向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27}“两山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理念,也是推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遵循。作为

引用本文:桑延海,刘兴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社会生产力属性的三重向度[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7(5):1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4AKS010);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4ZXZA004)

作者简介:桑延海(1991—),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当代发展研究。E-mail:1140247907@qq.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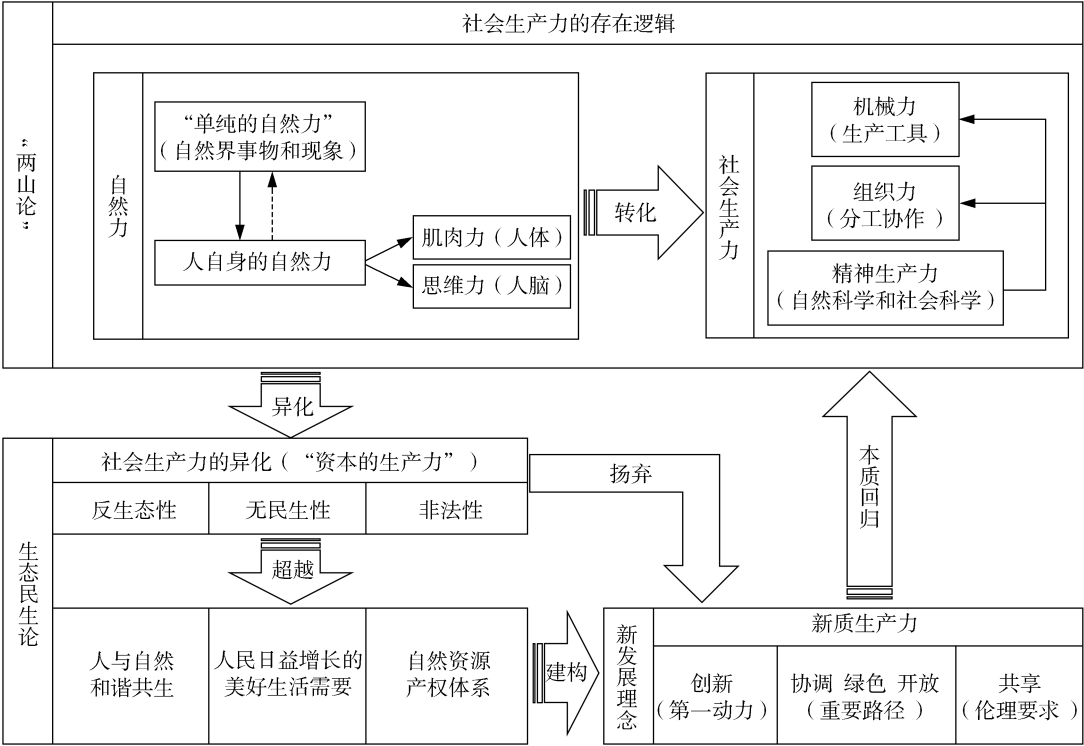


图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社会生产力的内在关联

旨在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理念,“两山论”指向的是自然生态系统及其运动的内在本质(自然力)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生产力)。就此而言,“两山论”的本质内涵是“自然力是潜在的社会生产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3]。因此,“两山论”的深刻意义在于,通过阐发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揭示了社会生产力的源泉和存在基础。

第一,“两山论”揭示了自然力作为客观威力具有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的先在性。“绿水青山”意义上的“自然力”主要指的是自然科学领域中所指的“主宰宇宙间物质运动的四种基本相互作用”^[4]或自然事物的机械性、化学性和应激性(有机性)运动所表征的力。不同于自己的物质表象,其是一种隐匿于自然现象背后,并能为人的感觉和知觉所感知和把握的一种本质性、规律性的存在。需要明确,由于人本身是自然系统的一个要素,因而“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

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161}。所以,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1]137},二者同属自然力系统。就生态自然力来说,“单纯的‘自然力’具有先在性和基础性,‘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6]225}。从个体生存角度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7]90},从社会发展层面来说,自然力或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3]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的兴盛以水草丰茂、生态优良为基础,而生态退化、环境恶化成为文明衰亡的直接原因,这也体现了自然力的反作用机制。就人自身的自然力来说,包含两个维度。一是表现在物质生产劳动中的肌体肌肉力,即“劳动的自然力”,这种自然力完全受生态系统之自然力的制约。生态破坏、环境恶化直接危害的是群众的身体健康,“所以,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7]84}。二是人脑所具有的思维力,即马克思所说的“精神生产力”^{[8]176}。人可以运用自身的这种能力,形成关于自然力表现自身的形式、条件、作用范围等科学规律,并在此

基础上将自然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这种思维力内在于人的感性、知觉、知性、理性、情感等意识形式的活动过程,通过语言、文字、符号、代码、行为等方式表达出来,并能够作用于一定的物质实体或物质能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维力在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认为“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6]104}。处理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7]23}。因此,人脑的思维力对肌肉力的具体运动(或者说思维方式对行为方式)以及对自然力向社会生产力的转化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两山论”蕴含着自然力向社会生产力转化的基本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2]32},其本质在于科学合理地推动自然力向社会生产力转化。纯粹的自然力的存在状态、显现条件、表现形式、实际威力等往往是偶然性起支配作用,而所谓的社会生产力,实际上是人们对自然力的积蓄和调配,是必然性起支配作用的自然力,是能够为人类社会所控制的自然力。尽管社会生产力的物质表象是人的劳动创造,但其本身是由自然力转化而来的,即是由自然现象的“单纯的自然力”转化而来的生产工具力、由人的肌肉力转化而来的组织力和由人脑的思维力转化而来的精神生产力。从生产工具力来看,现代机器体系的动力来源,要么直接利用自然界的风力、水力、电力、热力、磁力等,要么通过创造能够生成或利用自然力的条件而获得,同时,机器制造本身所需物质材料也来源于自然物质。针对传统能源结构和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发展模式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7]59},走绿色清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从社会组织力来看,个人需通过社会性的分工和协作,实现行为、思想和意志的一致,才能将自身的自然力作为一般社会力或社会生产力,“达到他作为孤立的个人所不能达到的生产率”^{[9]291}。作为精神生产力之表征的科学乃是意识所建构起来的关于整个世界的运行规律,它一方面是关于物理世界的机械性、化学性和应激性之自然力的自然科学,另

一方面是关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组织的社会科学^[10]。所以,科学既是人们基于自己时代的物质生产需要而历史性地建构出来的关于自然力表现自身的形式、条件、作用范围的规律,又通过生产工具进入并改造社会生活。就此而言,现代社会的生态问题、组织问题,本质上需依靠科学理论和生产技术的革命才能解决。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实施优化产业结构、构建低碳能源体系、发展绿色建筑和低碳交通、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7]31}的原因所在。

第三,“两山论”揭示了自然力是有待合理利用的潜在的社会生产力,违背自然力的规律必将遭受反噬。虽然集生产工具之力、组织之力和科学之力于一身的现代机器体系表征着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但这充其量意味着“人对自然力的胜利”^{[11]508},并非人凭空创造了新力量。自然力的能量遵循着守恒与转化定律,所谓的社会生产力不过是人们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生产而对自然力进行积蓄、控制和调配的结果,人们所能改变的只是自然力发挥作用的条件和存在形式。自然力既不是纯粹自为的力量或对人而言的自在威力,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社会生产力,人们可以在保护的基础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7]131},而且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3]。然而,自然生态系统、自然力具有自身运动规律,人类所能利用和改造的只是自然力的一部分或个别面向。如果人们无视自然力,或者说,当人们掌握了自然力的个别面向便自以为穷尽了自然力而恣意妄为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3]。同时,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某一种自然力的效能的认知和利用是有限的。因此,自然力只是社会生产力的自然基础,其向社会生产力的转化,需要建立在人们对自然现象及其内蕴的规律的充分尊重、科学认知和合理利用的基础之上。

二、生态民生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社会生产力异化超越向度

机器体系发轫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

业,其所蕴含的巨大社会生产力沦为“资本的生产力”具有历史必然性。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机器的使用不仅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使人们面临深刻的物质生存危机,而且使人沦为从属于资本并受资本家支配和剥削的价值增殖之物性工具,失去法权属性和精神生存属性。因此,“资本的生产力”是反生态、反民生的,其作为“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9]184},根源在于资产阶级对自然资源和生资料的非法占有(更为本质的意义上来说是对自然力的非法占有)。基于此,自然生态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2]36},而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核心是民生。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反思社会发展模式、总结社会发展经验、锚定文明持续进步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民生论的理论主张,“民生是最大的政治”^[12]“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3],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13]。就此而言,生态民生论的提出,是对物质民生问题得到改善后,系统性的生态问题影响甚至威胁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背景下的理论回应,是对作为社会生产力异化形态的“资本的生产力”的积极扬弃和系统超越。

第一,生态民生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超越了“资本的生产力”的反生态性。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价值增殖运动,“资本的生产力”实际上是资本增殖自身的能力,因而“对资本来说,任何一个对象本身所能具有的唯一的有效用性,只能是使资本保存和增大”^{[8]227}。资本当初将活劳动并入自身并最大限度地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等是为了获取绝对剩余价值,现在它控制、驯服和节约自然力是为了获取相对和超额剩余价值。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建的“生产-消费”循环体系斩断了物质生产同人的现实需要、感性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对资本来说,商品的物性使用价值固然重要,但只是针对剩余价值的实现(出售)和再生产(转移)而言。商品出售(而不是消费)即实现价值增殖,通过再生产改变它的物性形态则完成自身价值转移和剩余价值生

产,至于个人实际需要多少产品、是否真正得到满足,并非资本关心的核心。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11]587},无节制地征服自然力而将之转化为“资本的生产力”,而且毫无节制地刺激消费、鼓励浪费,对自然界造成持续性破坏。在这一层面,资本主义生产、“资本的生产力”本质上是反生态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基础,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14]。自觉保证人们生存所需要的空气、饮用水、食品等的优良与安全,“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15]。自然生态、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力的来源和基础,自然事物对于人的生存具有不可或缺性、不可替代性,即“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的存在”^{[5]187}是辩证统一的。

第二,生态民生论注重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超越了“资本的生产力”的无民生性。民生是一个动态范畴,不同时期内涵也不尽相同^[16]。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且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纯粹自然力,民生问题表现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供给。工业文明时代,生产力实现巨大飞跃,但资本发展生产力并不是为了减轻生产者的劳动负担、增加生产者的物质财富和自由休闲时间,而是为了攫取更大的剩余价值。生产条件的节约不仅是增长利润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造成工人夭折、衰老加速、生命和健康浪费的原因”^[17]。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发展实际上堕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或增殖自身的能力的发展,即“资本的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生产者参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是其“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11]197}。“整个物质财富世界以及物质财富的一般形式即交换价值,都作为别人的商品和别人的货币与它相对立”^{[9]44}。由此观之,“资本的生产力”尽管是在物质生活需要或物质民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根本不关注民生,“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11]31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基于民生现状和需要来反思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和着力点,并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学说——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与人民需要之间的辩证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18]。针对“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19]的民生需要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增进民生福祉的优先领域”^{[2]37}。因此,生态民生论的提出,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生产力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与尊重,彰显了其高度的理论自觉、深邃的历史自觉和崇高的人民情怀。

第三,生态民生论要求健全自然资源产权体系,超越了“资本的生产力”的非法性。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不仅是资本自身的价值向商品的转移过程,也是资本的增殖或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过程。然而,剩余价值的创造连同资本自身价值的转移,全部是由作为可变资本的活劳动所完成的,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资本自身并不具有现实的生产性,它的生产性只不过是支配活劳动“进行剩余劳动的强迫力量”^{[1]396}、支配整个劳动过程的客观权力的再生产。资本作为一种关系、一种支配活劳动及其产品的权力,乃是由于活劳动转化为可变资本、生产资料转化为不变资本,而资本家之所以拥有这种权力,“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5]130}。从“自然力-社会生产力”的本质关系看,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暴露了资本家对自然力(包括人自身的自然力)及其转化形式(社会生产力)的非法侵占。因此,“资本的生产力”这一说法本身就是非法的,而生态危机则是自然对此非法行为最严厉的报复。事实上,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0],“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6]225}。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机的身体和人与人关系的纽带,而人对自然来说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质、自然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前提,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5]187}的关键。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

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21]而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也不应沦为少数人攫取利益的工具。面对当前的生态民生需要,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指出要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实际承载量的基础上明确所有权性质、使用权边界和直接责任主体,即“坚持资源公有、物权法定和统一确权登记的原则”^{[2]32},还指出国家对全民所有的公共自然资源及其使用只是行使管理权和监督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使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6]293}。就此而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关于自然资源产权体系的理念,不仅是对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非法性的超越性建构,还是使社会生产力真正回归社会、回馈民生的法权实践。

三、新发展理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社会生产力本质回归向度

发展是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以及生态优先、节能减排、生态环保方针,并非要求减生产、停发展,而是主张“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2]59}“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6]167}。这在“资本的生产力”和传统发展模式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其将自然和他人看作应当加以占有和利用的“为我之物”,并呈现出外延性的显著特征。与之不同,绿色生态发展模式表现为内涵式发展,即在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中看待自然和人自身,并通过深化对其规律性认知而发掘更深刻、更丰富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同时,由于“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6]104},绿色生态发展模式的实践理念集中体现于新发展理念,且绿色生态新发展模式表征着新质生产力(或者说其以新质生产力为内在本质),即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前提,以创新驱动、人才引领、科技赋能、

产业优化为内涵,以高质量、高科技、高效能、生态性、民生性为特征而契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2]。换言之,新发展理念关于绿色生态发展模式及其蕴含的新质生产力的思想理念,是新质态的精神生产力发挥作用的结果。

第一,绿色生态发展模式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变革、产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革命,均建立在生产工具、社会组织样态(分工协作)及意识所建构起来的关于这两个方面的科学创新基础之上。这一“生产力发展-产业革命-社会革命”的社会发展逻辑具有历史客观性和历史真实性。但在上述逻辑中,周期性的社会动荡或大崩溃、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等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些现象常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代价。既然社会的组织性及其模式本身也蕴含着巨大社会生产力,那么所谓的“代价”就只能是人们对社会生产力浪费的无知,或者说对社会生产力的认知还不够科学。导致这一片面认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结果的资本家眼中的超额利润或客观上的超额剩余价值被错误地当作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和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而发展的本质——创新,被颠倒性地当作偶然的事情。生产资料的集中、机器的大规模使用和改良、生产排泄物的循环利用、科学发明,都不同程度地表征着生产力的发展,但资本家之所以愿意这样做,只是为了节省不变资本的投入比例以实现高利润率,从而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因此,作为发展本质的创新,在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中是自为的、自发的,或者说其对人类社会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在的。但是,创新与发展是本质与存在的关系,真正的发展必然是创新基础上的对旧事物扬弃和损益的上升运动,“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23]80-8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必须改变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产业的粗放发展模式,“把发展的基点放到创新上来,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6]174}。绿色生态发展模式对传统发展模式来说本身是一场发展观的革命,是在“依靠科

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6]145}的基础上,“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6]168}的发展模式,是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的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创新”^{[23]82},人才、专利、标准是新时代的战略创新资源,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

第二,绿色生态发展模式以协调、绿色、开放为重要路径。由于“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唯一的家园”^{[6]270}“绿色低碳转型是系统工程”^{[6]256},推动形成绿色生态发展模式必须践行协调、绿色、开放理念。其一,协调理念是推动形成绿色生态发展模式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6]105},推动形成绿色生态发展模式“要注意调整关系,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6]105}。作为发展观的革命性突破,绿色生态发展模式必然涉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变革、既定平衡和规则的重构。这要求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即“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23]84},坚持手段与目的、标准与尺度、潜在和现实、质变和量变、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把握和调整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其二,绿色理念是绿色生态发展模式区别于传统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传统生产力驱动的社会发展模式,在物质生产上表现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24];在尺度和标准上将GDP增长简单等同于发展的数字游戏和速度游戏,具有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高浪费和低利用率弊端。而绿色生态发展模式以绿色为核心价值,在科技和产业发展方面,“要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自觉以对规律的认识指导行动……要从全球变化、碳循环机理等方面加深认识,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23]117-118};在制度机制方面,则要“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绿色

消费激励机制,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25]。其三,开放是现代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的基本特征,其关涉的是绿色生态发展模式的内外联动性,注重的是世界的整体性。马克思在考察资本流通时指出,资本的增殖本性“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8]388},因而世界市场、世界历史是资本运动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历史和事实证明,人类社会正是在马克思所揭示的规律中运动发展的,同时,环境恶化、气候极端化、大气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凸显了世界的整体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征,而“开放是国家进步的前提”^{[23]477},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第三,绿色生态发展模式以共享为伦理要求,这一特质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生产力的自然基础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共同决定。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客观规律要求共享发展。无论是从物质表象还是从作为内在本质的力来看,“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6]225}。不仅人的生命所需要的物质产品源于自然,而且社会生产力根本上源于自然力,是自然力的转化形式。“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35},同时,自然力本身是内在于生态系统和生命系统的一个有机整体,这决定了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理由、也不可能将全部自然力占为己有,更不能将自然力当作征服世界的工具。由此可知,共享理念正是“自然力—社会生产力”的系统性和公共性所规定的。另一方面,共享理念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和伦理显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23]95}。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表现为主体维度的全民性、客体维度的全面性以及过程维度的共建性和渐进性,而从本质来看,毋宁说它首要强调的是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公有性,及其运用上的公平合法性。也就是说,共同富裕内在的蕴含着共享的价值目标和伦理规范,要求

社会将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只是作为人与人关系的纽带、作为全体人民共享的财富,而不是少数人或少数团体的私有财富和特权。只有在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共享的基础上,才能“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23]97},推动共同富裕从理论构想转化为实践进程。

总的来说,绿色生态发展模式是“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生态保护型、循环经济型”的新发展模式,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实践理念。从社会生产力的维度来看,绿色生态发展模式具有3个特征:一是高度重视精神生产力及其发现和创新的客观规律、科学理论的发展模式,是通过理论创新而自觉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模式,因而具有人才、科学、技术、产业等方面高度集中和大力创新的高质量、高科技的特征;二是充分尊重自然力的客观性和先在性,并自觉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这一矛盾置于“自然力—社会生产力”这一更为整体的维度来看待和处理的模式,因而具有资源利用率高、全要素生产力充分发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效能和生态性之特征;三是坚持“自然力—社会生产力”系统对于人类社会的公共性、共享性的发展模式,具有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民美好生活充分保障的民生性之特征。因此,绿色生态发展模式要实现3个转变:从征服自然、牺牲自然求生存向认识、尊重和利用自然规律谋发展的转变;由技术革新、产业革命先行向科学创新、理论创新先行的转变;社会发展由自发向自觉、由分裂对抗向合作共赢的转变。绿色生态发展模式的转变过程,既是异化了的社会生产力向其本质的回归过程,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过程,新发展理念则构成了上述转变或绿色生态发展模式和新质生产力的实践理念和基本内涵。

四、结 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对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关系进行反思的理论成果,其根本上是社会发展理论。从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来看,“两山论”、生态民生论和新发展理念等论述蕴含着系统的社会生产力理论。具体而言,“两山论”揭示了社会生产力的自然力基础和自然力向社会生产力转化的基本原理,既是关于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之间关系的科学认识论,也是社会生产力的存在论。生态民生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准则、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基础、以健全自然资源产权体系为法权实践,实现了对近代以来社会生产力异化为“资本的生产力”及其所展示的反生态性、无民生性和非法性的系统超越。新发展理念则以自身系统的动力规定、路径规定和伦理规定的逻辑构成了形成绿色生态发展模式和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规定,或者说,新发展理念本身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形成新发展模式的理论。三者逻辑递进、有机统一:“两山论”从力这一本质维度论述了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和社会生产力的存在逻辑,同时也构成了反思和超越生态问题的科学视阈;生态民生论是立足于“两山论”所揭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对生态问题所做的社会学之思;新发展理念则是对基于“两山论”关于社会生产力的科学逻辑和生态民生论关于社会生产力异化的反思与超越,是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科学思想。就此而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社会发展动力向度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而且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理论,不仅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更推动形成了全面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质生产力理论。对于绿色生态发展模式及其蕴含的新质生产力,其揭示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社会共同体的共享伦理和个人的天赋、才能等主体本质力量充分发挥等更为科学合理的新质社会关系的形成,因而绿色生态发展模式和新质生产力是向社会生产力的本质回归。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

[3]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3):4-19.

[4] 厉光烈.走向统一的自然力[J].现代物理知识,2012,24(1):17.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0] 韩士德.“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社科界纪念钱学森同志座谈会侧记[N].科技日报,2009-11-20(3).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19.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7.

[14] 习近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J].求是,2023(22):4-7.

[1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09.

[16] 张永红.习近平生态民生思想探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3):131-139.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M].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62.

[18]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0(2).

[19]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读本(2016年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33.

[20]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3.

[2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62.

[22] 贾若祥,窦红涛.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重大意义及发展重点[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4(2):31-42.

[23]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2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5.

[2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40.

(责任编辑:余迪)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Attribute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ANG Yanhai, LIU Xingping (School of Marxism, Hohai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that transcends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ls while guid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mbodies the attributes and dimensions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ich connotation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flects the objectivity of natural forces, the source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in natural forces, and the scientific transformation of natural forces into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livelihood, which addresses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s and nature, the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ural resources property rights system, demonstrates how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ranscends alienated forms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systematically reflecting upon and moving beyond the anti-ecological, livelihood-disregarding, and illegal nature of “capitalist productive forces”;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a green development model embodies the return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from an alienated state to its essence, or in other words, the promotion of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refore,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ot only represents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also serves as a theor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vilized society; it is not only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but also a theory for build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it not only develops Marxist ecological thought but also deepens the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wo Mountains” theory; theory of ecological livelihood;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